

郭
辉

著

National Memorial Day and Modern China (1912-1949)

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

国家纪念日是民国北京政府、国民党宣传政治理念、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措施和手段，政治文化作用于社会民众的重要媒介。通过回答国家纪念日如何为政权建设服务，揭示其功能的复杂多面，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通过国家纪念日对社会民众施加影响，解释国家纪念日表象之下的深层次内涵与意义。

(1912 - 1949)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National Memorial Day
and
Modern China
(1912–1949)

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

(1912 – 1949)

郭
辉

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：1912—1949 / 郭辉著. --

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 - 7 - 5201 - 3800 - 0

I. ①国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纪念日 - 研究 - 中国 -
1912 - 1949 IV. ①K892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6661 号

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 (1912—1949)

著 者 / 郭 辉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李期耀

责任编辑 / 邵璐璐 李期耀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近代史编辑室 (010) 59367256

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：100029

网址：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3

印 装 /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：20.75 字 数：273 千字

版 次 /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3800 - 0

定 价 / 9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出版得到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资助



目 录

o n t e n t s

导 论	001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编 国家纪念日与合法性的建构

第一章 “共和”观念：北京政府的国庆纪念日	027
一 制度设计：国庆日的生成	028
二 象征表达：国庆日欢庆纪念活动的操办	032
三 话语控制：“共和国庆日”的完成	039

第二章 “革命”记忆：国民党的黄花岗起义纪念	046
一 “烈士”与“国民”：民元的纪念	047
二 从黄花岗纪念日到革命先烈纪念日	052
三 纪念仪式的场景化书写	058
四 革命记忆的塑造	061

第三章 党国政治：国民党的国庆纪念日	065
一 夺取：“在野”立场的体现	065
二 整合：党国一体的塑造	074
三 运用：政治诉求的表达	086

第四章 消费政治：商家的国庆纪念日	100
一 “双十节”符号的运用与商品促销	101
二 “双十节”语言的运用与商品促销	111
三 余论：背后的故事	121

第五章 异化政治：国民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	125
一 抗战胜利庆祝与纪念日的出现	125

二 庆祝与哀悼：纪念活动的开展.....	130
三 纪念话语的表达.....	134

第二编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动员

第六章 御侮救国的宣扬：“九一八”纪念	141
一 纪念活动的进行.....	141
二 关注东北以纪念国耻.....	148
三 宣传国耻以凝聚精神.....	154
四 振奋精神以御侮救国.....	160
五 纪念活动的历史价值与功能.....	166
第七章 传统文化的发明：孔子诞辰纪念日	170
一 孔子诞辰纪念日的创制.....	170
二 纪念仪式的举行.....	177
三 教师节的植入与意义诠释.....	183
四 孔子思想的时代阐释.....	191
第八章 民族精神的建构：民族扫墓节	203
一 民族扫墓节的发明.....	203
二 民族扫墓典礼一：祭黄陵.....	209
三 民族扫墓典礼二：祭孝陵.....	217
四 民族精神的凝聚.....	221
五 知识精英对民族精神的理解.....	229
六 社会民众对民族精神的承接.....	235

第九章 领袖崇拜的制作：“抗战建国纪念日”	243
一 纪念日的制定	243
二 纪念活动的举办	247
三 抗战动员：言论主调的确定	255
四 领袖崇拜：言论主调的辐射	270
结 语	284
参考文献	301
后 记	318

许多人觉得“国家纪念日”是很有意思的东西，毕竟如今我们许多人是这些纪念日的亲身参与者，虽然参与的方式与形式各异。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购物消费，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讲话报告，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阅兵操演，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结彩挂灯，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友朋餐聚，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旅行参观。其实不管是现今抑或过去，乃至古代中国，节日于平民百姓的意义并未发生太大变化，反倒是国家层面的纪念日活动有不同的内涵与意义。

国家纪念日顾名思义是属于国家层面的纪念活动。纪念日的说法应始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，此前的所谓“万寿节”等，虽然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和操演性，但基本上属于古代的“仪礼”范畴，而未具备纪念日之性质与特征。显然，“纪念日”一词属于舶来品，但在中国则成为“传统”，具有了自身的本土化特色。笔者此处所言“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”希望较为全面地观察中国自有纪念日以来，国家纪念日在现代中国的演变历程。

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，国家纪念日即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每年都会举行大量的纪念活动，逐渐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少人还为国家纪念日的操演留下许多文字，记录他们的切实感受。许多内容在行文过程中皆有所表述，笔者在此侧重于简述以下几点内容。

一 研究意义与概念界定

1. 何谓纪念日？

“纪念日”一词人们并不陌生，比如说现在广泛使用的诸如结婚纪念日、生日等，这些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。假若要追寻一个问题：什么是纪念日？则可能会使不少人感到为难，多数人并未真正思考过，或许有人会回答如圣诞节、春节之类的例子。纪念日成为一个受人言说，含义却又相对比较模糊的“人言言殊”的词语。

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2002，增补本）中对“纪念日”做出如下定义：发生过重大事情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如国庆日、党建纪念日、国际劳动节。显然，该定义中指出那是一个发生过“重大事情”的日子，列举的几个纪念日也有明确所指，如国庆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事情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即每年的10月1日。其他列举的纪念日也分别有所指代。

如果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定义出发，可明显感觉到纪念日与节日之间有一定的差别，纪念日属于节日，但并不是所有节日皆属于纪念日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节日”的定义即包括两种：纪念日，如五一国际劳动节；传统的庆祝或祭祀的日子，如清明节、中秋节等。如此就能够较为明确地认识到“纪念日”与民俗节日的不同，民俗节日更多的是一种“习俗”，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，这种习俗“具有双重功能，即发动机和惯性轮。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。它所做的是，为所期望的变化（或是对变革的抵制）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、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”。而纪念日正如“被发

明的传统”。^① 如此理解则容易将纪念日与民俗节日相区分，纪念日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仪式性，而民俗节日更多强调其无意识性和自然惯性原则。

2013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，在“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”中，有新年、春节、清明节、劳动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，“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”有妇女节、青年节、儿童节、建军节。第五条还特别规定“二七纪念日、五卅纪念日、七七抗战纪念日、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、九一八纪念日、教师节、护士节、记者节、植树节等其他节日、纪念日，均不放假”。^② 显然，其中“节日”包括民俗节日与纪念日，但又将节日与纪念日作为并列名词，应该是取节日之狭义即民俗节日之义。该“办法”对节日与纪念日的使用比较模糊。特别是诸多的纪念日，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放假，但确实存在，只是很多人并不熟悉，此方面还需要大力进行普及教育和宣传。

不过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，“纪念日”并不都是一些“发生重大事情值得纪念的日子”。就纪念日的各种运用而言，能够感觉到纪念日本身也分层次。也就是说，“重大事情”需要看相对于什么对象而言。于普通人，如结婚、生日、生子、乔迁、死亡等这些日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如此纪念日的范围就比较宽泛。然而国家层面则应该是一些影响到国家进程、发展的重大事件，如国家建立、政党成立、领袖逝世等。所以，国际社会有纪念日，国家有纪念日，地方有纪念日，家庭有纪念日，个人也有纪念日。纪念日成为记忆过去的重要仪式，通过纪念日追怀已往，当然，更多的还是面向“未来”。

① 参见〔英〕E. 霍布斯鲍姆、T. 兰格编《传统的发明》，顾杭、庞冠群译，译林出版社，2004，第1—17页。

② 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13年12月12日，第2版。

2. “国家纪念日”概念

“国家纪念日”概念的提出显然是将纪念日进行分层处理，不是个人的纪念日，也不是家庭、地方的纪念日，更不是国际纪念日，所指称的是国家层面的纪念日。“国家纪念日”作为学术概念尚未有正式定义。此前有所谓的“全国灾难纪念日”，有人主张将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设立为全国灾难纪念日。国务院规定，地震后的2008年5月19日至21日被设置为全国哀悼日，全民包括国家领导人都为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人默哀。还有全国两会代表提出设立“国家烈士纪念日”，希望将每年的3月4日确定为“国家烈士纪念日”，并在这一天举行公祭人民英烈的活动。此主要是希望能够尽快建立公祭人民英烈制度，从而“缅怀英烈”，“激发全民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奉献精神”。^① 这些意见主要希望国家出面举办纪念日活动，其实我国早已存在类似的纪念日，如国庆节、建党纪念日等，现在是多一个纪念不同对象的纪念日。前文已经论及，真正使用“国家纪念日”这个词的有全国两会代表提出要设立“国家纪念日”以纪念和平年代的英雄和主张将白求恩逝世日（11月12日）定为“白求恩国家纪念日”。特别是希望白求恩国家纪念日的设置，“以国家和政府名义，在特定日期举行纪念活动”，这在很大程度涉及了“国家纪念日”中“国家”的某种含义。2014年2月27日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，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2014年8月31日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。国家也高规格地举办这些纪念日活动，如2014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。该日上午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、李

^① 《解放军代表建议设立“国家烈士纪念日”》，参见 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misc/2007-03/07/content_5814469.htm。

克强、张德江、俞正声、刘云山、王岐山、张高丽等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，与首都各界代表一起，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。^① 习近平的出席达到纪念的最高规格。不过，这些并非学术意义上的概念界定，这些代表的用意和纪念日设定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对“国家纪念日”进行概念框定。

2013 年笔者在《民族危机与政治动员：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增设述略》中首次正式公开从学术意义上使用“国家纪念日”一词，但只是简单地定义为“国家层面规定的纪念日”，而没有做出更多诠释。^② 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选定“民国国家仪式”作为研究对象，即使用“国家纪念日”一词，文章对“国家仪式”进行了定义。由于当时是将“国家纪念日”归属于“国家仪式”的一种进行考察，认为其义不解自明，所以未特别注明和界定。论文将“国家仪式”定义为“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，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，出于某种原因，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行为活动”。^③ “国家纪念日”出现有年，但学界一直未能客观地思考其定义和内涵。此次出于研究需要，有必要对之进行进一步说明。

前面述及纪念日相关内容，而“国家”二字显然并非指政治机构的国家。雷闻将古代“国家祭祀”定义为“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，其中既包括由皇帝在京城举行的一系列国家级祭祀礼仪，也包括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，因为相对民间社会而言，他们就是国家；就祭祀的目的而言，这种活动不是为了追求一己之福，而是政府行使其职能的方式，本身具有‘公’

① 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14 年 9 月 4 日，第 1 版。

② 郭辉：《民族危机与政治动员：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增设述略》，《抗战史料研究》2013 年第 1 辑。

③ 郭辉：《民国国家仪式研究》，华中师范大学，博士学位论文，2012。

的性质”。^① 论者将国家视作“在场”，而并不总是实际操办或参与。李媛称“国家祭祀是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，由皇帝或政府官员主持的仪式化的公共祭拜活动”，当然，政府官员可以是“中央政府官员”，也可以是“地方政府官员”。^② 其定义与雷闻不同，虽包括地方政府官员，但须在“国家或政府的名义”之下。本书对某些国家纪念日的研究虽涵盖国家纪念日的地方影响，但更接近于李媛所称“国家或政府的名义”之意。借用“国家祭祀”中的“国家”以结合“纪念日”，国家纪念日自然与“国家”有着直接联系。

此处出于特定研究对象需要，在笔者多年实证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，对国家纪念日做出以下定义：由国家规定的，并有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，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，为纪念发生过的重大事件，周期性进行纪念活动的特定日期。国家层面正式主导或者派员参加，此与民间的一些纪念日相区分，且强调国家政策的制定，或者说有正式文件进行规定。所谓“周期性”，一般是以“年”为周期。

3. “纪念日史”的提出

20世纪60年代，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思潮，其中即包括“新文化史”研究倾向的流行。新文化史研究肇始于法国，其后传播到德、美等国家，80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全面繁盛。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来源相当广泛，它“吸收了后现代主义、语言学、人类学、文学、文化研究理论的成果，放弃对宏大叙述和客观规律的追求，亦不把历史研究之目的看作获知历史之终极真相，转向强调意义的阐释，重视文化的建构力，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，它们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

① 雷闻：《郊庙之外——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》，三联书店，2009，第3页。

② 李媛：《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》，东北师范大学，博士学位论文，2009，第16页。

中的”。^① 新文化史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，但主要宗旨在强调文化的作用，注意文化研究。另外，新文化史在视角上也注重微观史，微观史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，以卡洛·金兹伯格和乔万尼·列维等人为代表，他们采取“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、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”的研究方法。^② 微观史学的兴起受到“格尔兹文化人类学和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，并同当代西方史学总体趋势转向中的新文化史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”。^③ 此道出史学界多种思潮间的激荡关系，也指出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的关联性。正是这种朝向微观史研究视角的转变，眼光向下，符合新文化史从“宏大叙事”转向更加注重普通民众、日常生活、微观历史的研究。^④ 这些变化为史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。

正是在如此史学本质的追求下，仪式、纪念活动等自然而然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。西方研究者在此方面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，如莫娜·奥祖夫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节日的研究，C. 里瑞克对法国节庆的研究，林·亨特对法国大革命中仪式、纪念活动的研究，D. M. 伯杰龙对英国市民庆典的研究，^⑤ 等等。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，在西方已形成蔚然之势。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考察仪式、纪念活动本身，而是侧重于揭示仪式、纪念活动的政治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。中国学界受西方影响，也开始了对仪式、纪念活动的研究。本书即是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提出“纪念日史”这一概念，以求能够深化学界已有研究。

① 《编者的话》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、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《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，第1页。

② 周兵：《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》，《学术研究》2005年第3期。

③ 周兵：《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》，《学术研究》2006年第6期。

④ 梁景和、黄巍：《西方新文化史述略》，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0年第3期。

⑤ 相关内容参见〔英〕E. 霍布斯鲍姆、T. 兰格编《传统的发明》，第132—133页。

“纪念日史”虽然研究纪念日本身，但重点在纪念日之外政治、文化意义的阐释，并关涉纪念日的功能、效果。本书对国家纪念日与政治文化的关系、国家纪念日的功能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，希望能够从根本上助益国家纪念日或者说“纪念日史”的研究。

4. 现代前夜的“国家纪念日”

纪念日文化在传入中国后，显然不再是西方式的纪念日，而是中西相关文化的交织，不仅借用了西方纪念日文化的相关内容，而且受到古代中国礼仪、节日文化的众多“滋润”，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相当普遍。其实，西方纪念日文化与中国古代的礼仪、节日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，这些相似之处往往能够更好地消除国人吸收西方文化时的陌生感，有利于国人接受西方新事物。但是，这种相似性也恰恰影响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真正理解。

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指出：“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新政，其中，改变万寿圣节的形式，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。”但与当时梁启超介绍的“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”的概念不同，梁氏认为纪念日“不是庆祝君主诞辰，而是通过纪念过去‘事业’养成国民之爱国心”。^①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西方影响和新政推动下，清末万寿圣节发生不少变化，从原本限于官方或朝廷的封闭性朝贺，转变成与民同庆、举国同欢的“大众型纪念日”，并被赋予一定政治内涵。不过，虽然朝廷实行新政，但因政治制度未更动，新式外表下内质“依旧如故”。《大公报》在1905年法国革命节之际，发表题为《法国革命庆典问答》的论说，用“问答”的形式介绍法国革命及革命知识，包括：“法人何故革命”；“何谓破巴士的狱”；“法人叛乱之行为

① [日]小野寺史郎：《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？——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》，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1年第5期。

也，在我中国固视为大逆不道者，胡为反成为历史上至美谈乎”；“革命虽为公理，然不能不牺牲国民之生命，破坏社会之安宁，然则亦有以防之乎？”且最后认为“吾既为法国贺，吾不禁复为我中国忧”，所忧者即“我中国之革命党秘密召集羽翼已遍布全国”。^①此文实借此宣传政治改良思想，希望清廷能够吸取经验教训，及早实行政体改良，防止爆发革命。

不唯如此，因民间对“新政”的渴望，西力激荡下的“万寿圣节”渐成宣传立宪工具。报刊通过“万寿圣节”表示支持光绪皇帝，将之书写成开明君主形象，希望其能够亲政。有“万寿节”言论称：“我皇上之忠于国事也，戊戌事变之际，臣下阻扰变幻百出，而我皇上惟毅然决然，尽取中国之弊政一一禽薙而兽弥之，除恶务尽，其英断实超越乎汉之孝武。虽俄之大彼得，日本之明治，不是过也。”将光绪皇帝比作彼得大帝、明治天皇等杰出改革者。而在处理“义和拳肇乱”上，亦“惟我皇上一人知衅不可启”，事后也“言我不自持大柄，诛戮匪党以谢天下，外人必将代我为之，中国大臣而使外人加刃于颈，主权何在？”于是才“勘定内乱”“顺时布政”。^②言辞中有为袒护光绪而不顾事实者。万寿节中有言论认为：将光绪比作彼得、明治，乃“东人”与“西人”的印象，“予”“尝见东人而问之曰：我皇上何如也，曰：中国之明治也；又尝见西人而问之曰：我皇上何如也，曰：东方之大彼得也”，^③通过外人之口褒赞光绪，用心良苦，如此开明君主可惜未有实权。实施新政后，国人对慈禧垂帘听政颇有微词，希望光绪能够“早亲政。皇上不亲政则无实权，无实权则不能大有所为。不能大有所为则虽亦名为变法号曰维新，然所改革之事，终属枝枝节节，无补于国家全局。我皇上如果亲政则实权在握，必有以救国家之危急

① 《法国革命庆典问答》，《大公报》1905年7月14日，第1—2版。

② 《万寿祝辞》，《大公报》1902年7月30日，第2—3版。

③ 《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》，《大公报》1903年8月18日，第2版。

者。而况我皇上久为外国所钦佩，如果亲政，则外人之谋我中国者或可一变其方针，不复敢藐视我中国。是皇上之亲政与否，实于国家存亡有密切之关系”。^① 光绪亲政问题实际上关涉新政实施，稍后更认为光绪亲政关乎立宪实行，没有皇帝，谈何立宪。

“万寿圣节”的文字宣传，表明中国人已认识到只有立宪才能振国权，并希望能早日实行立宪，^② 阐述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合理合法性。20 世纪为专制政体消亡的时代，日本通过立宪而“行将与欧美各大国匹敌者”，俄国也因与日本一战，有改革政体之动向。何况原本“我皇上戊戌变法已显露改立宪政之基，今之时局较戊戌为尤危急，改立宪政，此即其时”。国际国内并非无立宪环境和基础，如今，要想中国能够富强则“必先保国之寿命，欲保国之寿命，必自改立宪政”。^③ 立宪与否关系国家存亡。要求朝廷能宣布立宪年限，以图“安人心而定国是”。^④ 立宪为国家当务之急，只有行立宪才能巩固国家基础，实现长治久安。“万寿圣节”用以宣传君主立宪，借“仪式”进行“政治操演”，已显“现代”苗头，但其背后支撑的整个体系依然是“王朝”、“朝廷”和“帝王”。

立宪改良的主张者，甚至当时中国政府，在对待法、美纪念日文化上抱持比较宽容的态度，政府大员“在遇到礼仪问题时总爱询问法国公使馆”。^⑤ 但中国显然尚未有真正的纪念日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纪念日，虽然表面学习、借鉴西方，但骨子里有着另一番打算。当然，就算到民国时期，在纪念日形式上，设置关于某些事件与人物的“纪念日”也是典型的西式纪念。在纪

① 《今上皇帝万寿祝辞》，《大公报》1904 年 8 月 7 日，第 2 版。

② 《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》，《大公报》1903 年 8 月 18 日，第 2 版。

③ 《今上皇帝万寿祝辞》，《大公报》1904 年 8 月 7 日，第 2 版。

④ 《今上皇帝万寿祝辞》，《大公报》1905 年 7 月 28 日，第 2 版。

⑤ 《中国皇帝的葬礼》，章开沅、罗福惠、严昌洪主编《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》第 7 卷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6，第 144 页。